

天下
| 贸易 |

卡尼访华,中加经贸的春天来了?

■ 晃弘扬

近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达成一系列务实安排。这是加拿大总理八年来首次访华。此访中,双方签署了《中国—加拿大经贸合作路线图》,在关税调整、市场准入等具体领域形成初步安排,为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恢复增长提供了制度性依据。

卡尼访华期间,双方重点围绕农产品贸易、清洁能源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对接。加方在处理对华电动汽车关税问题上提出具体调整方案,中国方面则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反倾销措施作出积极调整,双方在农产品与新能源汽车领域形成对等的经贸安排。据此安排,加拿大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一定配额,并将关税下降至较低水平;中方则将逐步降低对加拿大油菜籽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恢复市场准入并扩大进口规模。协议消息传出后,中国进口商迅速重启对加拿大油菜籽的采购,相关货船订单在短时间内落地,显示市场对这一政策安排积极响应。

卡尼访华具有多重现实背景。首先,加拿大农业部门长期依赖对外出口市场,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油菜籽消费市场,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需求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过去几年,由于双边关系紧张,加拿大油菜籽对华出口曾出现断档,直接影响到加拿大农业社区的生产预期和市场布局。因此,通过高层访问推动经贸安排落地,有助于恢复加拿大油菜籽出口渠道,稳定市场预期,回应国内农业利益群体的关切。

其次,加拿大正处于能源结构调整与交通电动化推进阶段。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而中国在电动汽车制造、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积累了较强竞争优势。加拿大国内市场对高性价比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具有现实需求,此次双方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达成的配额及关税优惠安排,有助于丰富加拿大市场供给,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此外,当前国际贸易环境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关税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的调整频繁,对外贸环境不稳定性增强。加拿大在推进对外贸易多元化的过程中,寻求与包

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保持稳定经贸关系,以分散外部风险、增强出口弹性,成为卡尼政府政策的重要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中加双方以对话协商、阶段性合作安排为主要方式推动经贸关系恢复,是基于务实考虑的选择。

而在推进新能源汽车领域合作方面,中国电动汽车产品进入加拿大市场具有一定现实基础。加拿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体仍处于成长阶段,消费者对产品性能、价格水平和售后服务具有实际需求。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电池技术、整车制造和零部件供应链方面积累了较成熟的产业体系,在满足加拿大本地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合规要求的条件下,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通过配额制度和关税调整等安排,可以使双方在可控范围内开展合作,有助于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

不过,在推进此类经贸合作时,也应充分考虑实际操作中的注意事项。北美市场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政治敏感度极高,即便当前关税有所下调,也必须将反补贴、反倾销以及以安全、数据为名的监管收紧趋势视为长期变量。企业在进入加拿大市场之初,就需要把贸易合规和证据链管理前置化,确保成本结构、定价逻辑、渠道安排和售后政策经得起审查。

与此同时,加拿大市场并不能被简单视为“进入北美的跳板”,在美方高度警惕的背景下,企业必须严格区分市场边界,避免在产品流向、数据管理和渠道设计上留下模糊空间。

在产品和运营层面,加拿大对安全标准、冬季性能和召回制度的要求极为严格,一次质量或安全事件就可能迅速放大为政治与舆论问题。循序渐进、以试点积累数据,再逐步扩展市场覆盖,显然比一次性铺开业务更为稳妥。同时,售后网络、备件体系和金融支持能力是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基本门槛,缺乏本地化组织能力的“轻资产出口”,在这一市场很难长期站稳。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加达成的并非是一项覆盖面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不意味着中加经贸关系已全面回暖。卡尼多次强调,加拿大并未准备与中国推进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选择,反映出加方在现实约束下的务实考量:在制度空间有限、政治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通过“小而实”的合作项目先行破题,既能缓解具体行业的现实压力,也有助于为双边关系止跌企稳创造条件。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国际背景下,中加务实合作安排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放眼更宏观的背景,特朗普再次上台

以来不断强化的贸易不确定性,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必须长期面对的外生成本。1月24日,特朗普公开威胁称,如果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将对所有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数小时后卡尼回应则强调加拿大将“聚焦公民经济自主权”。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加在保持对话与沟通的基础上构建务实互惠的合作机制,有助于稳定双边贸易关系,深化产业合作,并为两国企业开拓市场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在全球贸易格局演变的背景下,中加经贸合作模式也为其他中等经济体在多边框架与双边合作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借鉴。

总体看,坚持互利共赢、注重互补优势和在规则框架内开展具体合作,将为中加双方在当前国际环境中稳步推进经贸关系提供有力支撑。深化经贸互动不仅有利于推动农业和新能源产业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在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中稳固双方的长期合作基础,推动双方经济合作走向更加成熟、稳定的阶段。在全球经贸环境波动加剧的当下,这种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具体合作为支点的中加互动方式,或许难以制造轰动效应,却更有可能在风浪中保持稳定,也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图片新闻

春节将近,汽车出口火热。2月1日,专业汽车运输船靠泊江苏省苏州港太仓港区准备进行装载出口汽车作业。
中新社发 钟鑫旺 摄

以高水平开放塑造全球贸易新格局

■ 胡睿涵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以坚定的开放姿态和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截至2025年底,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连续9年实现增长;2025年全球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49个,其中贸易规模超过万亿、千亿和百亿元的国家 and 地区分别有14个、62个和137个,较2024年分别增加了2个、6个和10个。

面对多边贸易体制遭遇的挑战,中国始终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坚定支持者。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WTO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观、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遵循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不寻求新的特殊差别待遇,以自身开放促进共同开放,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14倍,人均GDP从约1000美元增至约14000美元。“十四五”时期,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20年的32.16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5.47万亿元,年均增长约8%。2025年中国进出口

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生效实施三年多来,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水平、货物贸易规模稳步提升,双方连续第五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担任RCEP非东盟方轮值主席国期间,与东盟方主席国印尼共同推动成立了RCEP支持机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实质性结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高于我国外贸整体增速2.5个百分点。共建伙伴占中国外贸整体的比重,继2024年突破50%后,2025年占比进一步提升至51.9%。中老铁路、金港高速公路和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有效提升了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面对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也支持未来电子商务协定的稳定文本,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贸易等前沿议题,相继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在绿色贸易领域,中国同样走在前列。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总额接近1.3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3.5倍,“新三样”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7.1%和48.7%。202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3.2%,拉动我国出口增长2.4个百分点。其中,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20.6%、21.5%和48.7%。特别是工业机器人,去年出口超过了进口,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展现出中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动能。

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中国发挥着关键作用。RCEP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由2021年的约64.5%上升至约66%,显示出较强的韧性。自2024年12月1日起,中国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所有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适用零关税待遇,体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十四五”期间,我国先后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79项制度创新

成果。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试点,80条试点措施基本落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从“顺利开局”到“成型起势”,成功封关运作。

外贸新动能不断涌现。2025年,自主品牌占中国出口比重同比提升0.8个百分点至21.8%。民营企业继续成为外贸“主力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突破千亿美元,中国同非洲各国深入落实“十大伙伴行动”,去年对非进出口近2.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多元化态势更加明显。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WTO改革;充分发挥RCEP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协同效应;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更加主动地提出规则方案;继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益,坚持包容普惠发展理念。

开放是促进改革、推动发展的重要法宝。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必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引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学生)

目前,随着全球市场融合势头不断加强,文化贸易已超越传统商品交换范畴,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体现。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091.9亿美元。这一数据背后,既反映出我国文化贸易规模的基础稳固,也揭示出发展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出口额同比下降1.6%,进口额微增0.8%,贸易顺差收窄17.3亿美元。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如何破解文化贸易发展瓶颈,已成为关乎国家文化战略的关键命题。

目前,世界各国推动文化贸易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

一是市场机制与产业链全球化的美国路径。美国文化产品占据全球市场四成份额,其成功之道在于构建了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了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科技为支撑的全球化生产机制。好莱坞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套融合全球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柔性生产网络。

二是战略协同与文化适配的韩国路径。“韩流”风靡世界,反映着政府战略引导与市场活力释放的有机结合。韩国通过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等专业机构,系统性地将文化政策转化为产业支持,形成了“内容创作—产业转化—全球传播”的完整链条。其特别值得借鉴之处在于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同时,通过精细化市场适配,实现了从区域影响到全球认同的跨越。

三是创意生态与金融赋能的英国路径。英国文化创意产业贡献了超过6%的GDP,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了创意、教育、金融的良性循环。通过税收激励、风险投资等金融工具创新,英国将文化创意从艺术领域延伸至整个经济体系。这种将文化价值通过金融工具实现市场化、规模化的思路,为我国文化资源转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前我国文化贸易发展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数字化深度引领,以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全面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形态;二是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文化资源通过现代表达转化为独特竞争优势;三是双循环互促格局加速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产品创新“试验田”和国际化“助推器”。

我国文化贸易的发展同时面临深层挑战:原创内容与品牌价值不足制约溢价能力;文化服务贸易长期逆差;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依然突出;兼具文化内涵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不足。抓住数字转型与内需市场双重机遇,突破内容创新与品牌化瓶颈,是我国从文化贸易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路径。

面向未来,或可通过以下路径,构建新时代文化贸易发展体系。

一是打造制度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议研究制定相关法律,建立全链条政策支持框架。重点发挥全国13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枢纽功能,将其升级为集创作孵化、数字版权交易、国际物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通过专项基金引导和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层次投入机制。

二是实施“内容提升与品牌创造”工程。建立国家级文化出口精品项目动态库,支持兼具文化内涵与市场潜力的创作。推动建立“中华文化现代表达”创新中心,系统研究不同文化市场的审美偏好和接受心理。通过中外合作制片、联合研发等模式,在合作中学习国际叙事体系和运营经验。

三是构建“文化+”融合创新生态体系。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推动“文化+制造”转型升级,通过设计赋能提升传统产品文化附加值。创新文化授权商业模式,构建中华文化IP的全球化运营体系。

四是优化全球市场布局策略。实施“区域深耕与差异化”市场战略;在东南亚市场强化文化亲近性传播,在欧美市场侧重现代表达和共同价值挖掘。深化“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化建设,共建文化创意园区。同时前瞻布局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培育长期增长点。

五是夯实人才与基础设施支撑。在高等院校设立文化贸易交叉学科,建立“产业—高校”联合培养机制。构建科学的对外文化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建立文化出口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支持专业机构开展海外市场法律、政策咨询服务,降低企业“走出去”风险。

我国文化贸易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引领”的历史性转型。丰厚的文化底蕴、完备的产业体系与领先的数字技术,构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面向未来,我们应以全球视野借鉴成功经验,以制度创新释放潜力,以内容创新提升价值,以模式创新开拓市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力的现代文化贸易体系。这不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使命。通过持续创新与开放合作,中国必将从文化资源大国稳步迈向文化贸易强国,为全球文化多样性贡献东方智慧。

(作者系中国国际商会文化和旅游产业委员会原专职常委、秘书长;中国国际商会文旅委员会顾问、专家组组长;国家对外文化贸易人才评审专家)

以创新驱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 张玉玲

中国企业要打好澳大利亚ESG新政策“预防针”

■ 柴裕红 王子昕

在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深度联动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逻辑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投资所必须考量的因素。

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投资国,其ESG政策的转型值得关注。澳大利亚气候治理的标志性转折点在于《2022年气候变化法案》的通过与实施。该法案提供,至2030年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3%,至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该法案将国家减排目标从一项政治承诺提升为具有明确法律约束力的联邦立法。

此举彻底结束了该国长期以来气候政策的波动期,给企业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长期政策确定性,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工具多元、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2022年气候变化法案》为基础排放设施设置逐年递减的排放基线。如果设施实际排放量大于当期基线,责任主体就要通过购买政府认可的澳大利亚碳信用单位(ACCUs)来抵消超额排放的部分。这一设计把碳排放的外部成本直接变成企业的运营成本,产生出明确的经济激励。

目前,澳大利亚正稳步推进立法,计划分阶段对大型公司及金融机构强制实施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相一致的披露要求。这表明,在澳大利亚达到一定规模的中资企业或者上市实体,必

须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来应对涵盖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目标四个维度的详细披露要求。

面对澳大利亚日益完善且强制的碳中和政策体系,中国企业不应采取零散、被动的临时举措,而应实施系统化、前瞻性的战略行动。

对中国企业而言,适应这一“碳约束”环境具有双重战略驱动力。从内部看,这是响应国内“双碳”战略、践行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要求的必然延伸。从外部看,这是在东道国市场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忽视当地法规会造成合规成本大幅增加、项目受阻、声誉受损的结果。双

重压力下,企业必须将气候因素纳入核心投资决策和战略规划流程里。

有意投资澳大利亚的中国企业应对企业资产、运营所涉的法律条文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要厘清澳大利亚联邦层面的通用规制和资产所在州或领地的特别法规,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应按照澳大利亚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体系标准,采用清洁能源监管机构认可的官方方法和工具,准确核算运营边界内碳排放量。量化的分析可以把抽象的气候风险转化为具体的预算项目,给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明确风险之后,中国企业应把ESG因素,尤其是气候风险管理,全

面融入核心的管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之中,实现由“外部合规驱动”向“内部战略驱动”的转变。

为满足监管与市场日益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中国企业应着手按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或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框架,准备系统性的披露工作。中国企业应开始系统收集、整理和分析涵盖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目标四大支柱的信息,建立可靠的数据治理流程,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可比性、决策有用性。

中国企业可以主动加入或者参与澳大利亚有关行业的低碳转型联盟、标准制定机构,以便不仅能够提前预判政策和技术趋势,还可以将自己的技术实践和关切反映在行业

标准里,从而在将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从长远来说,中国企业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和适应能力至关重要。能够在澳大利亚等严格监管市场率先完成系统性低碳转型,不但可以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更能获得全球产业链重构、绿色技术合作和可持续金融领域先机,在国际投资新格局中占据有利战略位置。

(作者柴裕红系兰州大学—甘肃省侨联涉外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子昕系兰州大学—甘肃省侨联涉外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为2025年度法治甘肃省级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出海法律风险和政策应对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